

潘光旦著

# 宣傳亦是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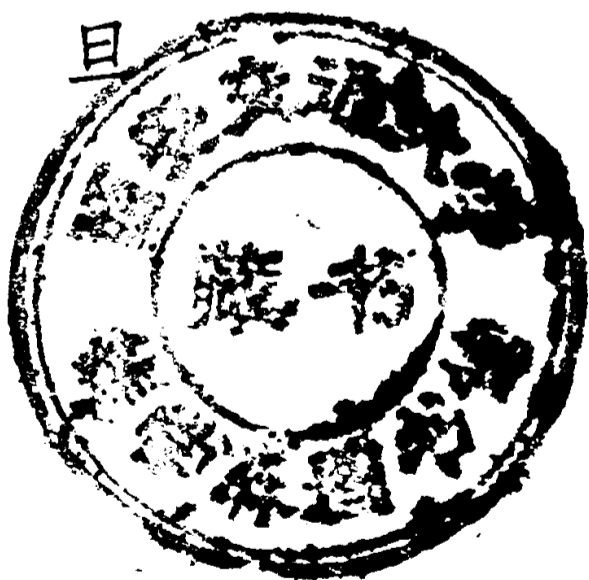
生活書店發行

時代評論小叢書

宣傳不是教育

著作者：

潘光旦



生活書店發行

宣傳是不教育

著者	潘光旦
編者	潘光旦 費青 吳晗 費孝通 王康
發行人	徐伯昕
發行者	生活書店
	上海·重慶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月初版

## 時代評論小叢書敘言

建設民主的中國是艱難而繁重的。要使中國的政治能向人民負責，不但政治機構要改造，人民對於政治的設施還要能積極的參加。人民對於國家建設的問題若沒有意見，民主的政治是沒有基礎的。因之，我們爲了要促進民主的中國，所以願意盡量的啓發，組織和表達人民對於中國建設的意見。這是時代評論社發刊小叢書的目的。

時代評論小叢書將陸續發表我們對於當前中國各種基本問題的意見。我們希望因這些意見的提出能引起讀者的討論和批評，我們願意爲讀者服務，凡是有系統的論文，不論見解和我們合不合，我們都願意編成這種小叢書，介紹給讀者。

編者

寒假期（民國二十九年）內，西南聯合大學的同學到四鄉去做了些兵役的宣傳，又舉行過不止一次的兵役宣傳討論會，在討論會的布告上用大字寫着：

「宣傳也是一種教育」，意思是深怕人家瞧不起宣傳，因而不高興參加關於宣傳的討論會，或是不熱心擔當宣傳的工作。我在這篇文章裏，準備向熱心從事

宣傳的人進一解：宣傳實在不是教育，不宜與教育混為一談，教育工作是越多越好，宣傳工作是越少越好，一件用一張嘴或一支筆來做的工作，要真有教育的價值，真值得向大家提倡，那就不客氣的叫它做教育就是了，大可不必襲用

宣傳的名稱；兵役的教育就是一例，那些瞧不起宣傳的人，對宣傳工作取懷疑態度以至於厭惡態度的人，是很有他們的理由的。

宣傳與教育都是一種提倡智識的工作，這一點是雙方相同的。但雙方相同的只限於這一點；不相同之點可就多了。

教育與宣傳的根本假定便不一樣。因為假定不一樣，於是提倡或施行的方式也就大有分別。教育假定人有內在的智慧，有用智慧來應付環境，解決問題的力量；教育不預備替人應付環境，解決問題，而是要使每個人，因了它的幫助，十足利用自己的智慧，來想法應付，想法解決。教育又承認人的智慧與其它心理的能力雖有根本相同的地方，也有個別與互異的地方，凡屬同似的地方，施教的方式固應大致相同，而互異的地方便須用到所謂個別的待遇。根據這兩層，近代比較最健全的教育理論認為最合理的施教方式是啓發，不是灌

輸，遇到個別的所在，還須個別的啓發。

宣傳便不然了。他所用的方式和教育的根本不同，而從方式的不同我們便不能不推論到假定的互異。宣傳用的方式顯而易見是灌輸，而不是啓發。它把宣傳者所認為重要的見解理論，編成表面上很現成的，很簡潔了當的一套說法，希望聽衆或讀者全盤接受下來，不懷疑，不發問，不辯難，這不是灌輸麼？這種灌輸的方式是說不上個別待遇的；說法既然只有一套，或差不多的幾套，又如何會顧到個別的不同呢？從這種提倡或施行的方式，我們便不由得懷疑到從事於宣傳工作的人多少得有如下的假定，否則他便不免氣餒，而對於他的工作無從下手。他得假定智慧是一部分人的專利的東西，只有這一部分人，比較很少數的人，才會有成熟的思想，才能著書立說，才有本領創造一派足以改造社會、拯救人羣的理想；其餘大多數的人只配聽取，只配接受，只配

順從；至少，這些人雖有智慧，那程度也祇到此爲止，說不上批評創造。『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兩句老話，民字，古人有訓暝的，有訓盲的，有訓泯然無知的，在民本與民治思想很發達的今日，我們不能承認這兩句話和這一類民字的解釋爲合理，真正從事於教育的人也不承認，但我們替宣傳家設想，卻真有幾分爲難了。

教育與宣傳的其它不同之點，可以就來歷、動機、狹義的方法、內容、與結果等簡單的說一說，這幾點雖沒有上文那一點的重要，但也可以教我們辨別一篇文字或一個講演的教育價值或宣傳價值。宣傳原是一個由來甚遠的提倡的方法，社會學家也一向把它認爲社會制裁的一個方式，不過把它當做一個社會問題看待，把它判斷爲近代社會病態的一種，卻是歐洲第一次大戰以後的事。十餘年來，歐美的思想家、教育家、社會學者、心理學者、尤其是社會心理學



者，在這題目上已經下過不少的功夫。我們在下文要說的話，大部分便是他們所已得的一些結論。

一篇宣傳性質的稿件往往會引起來歷的問題。我們看到一種宣傳品之後，時常要問這宣傳品究屬是誰的手筆。我們所能找到的答覆，有時候是一個籠統的團體的名字，或者是一個個人的兩個字的假名，有時候連這一點都找不到。約言之，宣傳品是往往來歷不明的，是沒有一定的人負責的。何以要如此？我們可以推測到兩個原因，一是內在的而不是外來的。宣傳的動機與內容也許有經不起盤駁的地方，所以作者不願或不敢把名字公開出來，願意藏身幕後；這是內在的原因。在思想與言論統制得很嚴密的社會裏，顧忌太多，動輒得咎，在所謂「正統」中的人爲了擁護正統而不能不有所宣傳，固然可以大張曉諭的做去，甚至於組織了機關專司其事，但在所謂「異端」的少數人士就沒有這種

方便了；他們除非是甘冒不韙而干法犯禁，便只有藏身幕後的一法。這是外鑠的原因了。但無論原因如何，在接受宣傳品的大眾中間卻發生了一個嚴重的問題。聽信麼？來歷不明，爲何輕易聽信？不聽信麼？其間也許有些很有價值的見解或主張，輕易放過了，又豈不可惜？大抵輕信的人最初是聽信的，但若宣傳的方面一多，甚至彼此互相抵觸，輕信的人也終於不再置信，而多疑善慮的人，則因來歷不明的緣故，始終不肯聽信，甚至於還要懷疑到幕後必有惡勢力的操縱指使等等。結果，在宣傳盛行的社會裏，究其極可以鬧到一個誰都不信誰、誰都懷疑誰的地步。宣傳的所以成爲社會問題，這是很大的一個原因了。不用說，這來歷不明的問題，在教育一方面是很難想像的。

教育也沒有動機或用意的問題。要有的話，根據上文啓發智能的一段理論，我們可以知道主要的動機還是在促進受教者的利益，而不是施教者自己的

利益。受教者終究是主，而施教者是賓。在宣傳一方面，這主客的地位卻往往是顛倒的。一個賣某種貨品的商人，在廣告裏說了一大堆價廉物美的話，好像是專替顧客設想，其實最後的用意總不脫「生意興隆，財源茂盛」。一個教門送宣教的人出去，爲的是要人改邪歸正，去禍就福，甚至於出死入生；從他們那種摩頂放踵的生活看來，他們的動機不能說不純正，用意不能說不良善，但從他們對於信仰的態度看來，他們依然是主，而接受的人是賓。他們篤信天下只有一派真理，只有這派真理可以挽回人類的劫運，不惜苦口婆心的向人勸導；從這方面看，他和那賣貨的商人根本沒有分別，同樣的名爲無我，其實有我。一個宣傳一種改造社會的理想或主義的人，所處的地位正復和宣教師的相似，他費上無限量的筆墨與口舌的功夫，爲的是要人羣集體的生活進入一個更高明的境界，不錯，但我們不要忘記，他費上了這許多功夫，也爲的是要成全

他的理想，他的理想的他字上照例要加上一個密圈。

不過從接受宣傳的人的立場看，商人、牧師、和主義宣傳家的努力總見得太過於一相情願。同時有別家的出品、別派的信仰、別種的主義在，他爲甚麼一定要接受這家的，而不接受那家的呢？他也許根本不需要這商品；也許正期待着科學家給他一個比較正確的宇宙觀、人生觀、社會觀，而無須乎一派特殊的宗教與社會理想來撐他的腰。這種物欲少的人，與不做白日夢的人，社會上並不太多，只是廣告家與宣傳家太過『心切於求，目眩於視』，看不見他們罷了。自從廣告術與宣傳術盛行，這種人也確有日漸減少的趨勢，宣傳的所以成爲社會問題，這也是方面之一了。

教育與宣傳又各有其狹義的方法，我說狹義的，因爲廣義的上文已經說過，就是啓發與灌輸的分別。在宣傳方面，所謂狹義的方法事實上只配叫做伎

倆。這種伎倆有屬於機械性質的，有屬於藝術性質的，例如交通工具的利用，又如公務機關會客室裏琳瑯滿壁、五光雜色的統計圖表等等；但這些還是伎倆之小者，我們擱過不提。最關重要的是屬於邏輯性質的一些不二法門。研究這題目的人普通把這種伎倆分做四種。一是隱匿，就是把全部分或一部分的事實壓下來，不讓接受宣傳的人知道。二是改頭換面，大的說小，小的說大。三是轉移視線，就是，把大眾的注意從一個重要的甲題目上移到比較不重要而比較有趣的乙題目上。四是憑空虛構。這四種伎倆都是無須解釋的，大凡不修邊幅一點的宣傳家，包括一部分的新聞事業與廣告事業的人在內，大都很擅長，而在稍微有一點眼光的接受宣傳的大眾，也大都看得出來，決不會每次上當，不過，就一般的社會影響而論，總算一定是很壞的。一個問題的解決，一方面固然靠人的智慧，一方面也靠比較準確的事實的供給，如果負一部分供給責任的

人可以任意播弄，指黑爲白，甚至於無中生有的捏造，其勢必至於增加問題的複雜性而永遠得不到解決的途徑。至於教育一方面，無論近年來研究教學法的人怎樣的設法花樣翻新，這一類的弊病是沒有的。

其次說到內容。這和上文所提的方法或伎倆很難分開。它和動機也有密切的關係。內容的價值如何，當然要看動機純正到甚麼程度與伎倆巧妙到甚麼程度了。大抵動機純正的程度，與伎倆巧妙的程度成一個反比例。不過我們即就動機比較純正的宣傳說，它多少也得用些伎倆，而這種伎倆勢必至於影響到內容的價值。這種宣傳家總喜歡把一個問題看得特別的簡單、而提出一個同樣簡單的解決方案來，把問題看得簡單，也許故意的看得簡單，是伎倆，而這伎倆是近乎上文所提的改頭換面的一種。把方案提得簡單，便是內容了。舉一兩個淺近的例子看。有的宗教把人世的痛苦都歸到初元的罪孽上去，是何等簡單的

一個問題的認識與問題的診斷？只要大家能懺悔，以前的孽債就可以一筆勾銷，而新生命可以開始，又是何等簡單的一個解決的方案？孟子是中國古代很有力量的一位社會改造家。改造家照例不能不用宣傳，而宣傳家照例得有一套關於問題診斷與問題解決的說法，即，照例得有標語與口號一類的東西，照例得有一個幌子。孟子的幌子只有十來個字：人性本善。人皆可以為堯舜。——他的診斷和一部分宗教家的恰好相反，而簡單的程度，則彼此如出一轍。人性是何等複雜的問題，以孔子之聖，還不免諱莫如深，而孟子信手拈來，便下一個「本善」的妙諦，不是很奇怪的麼？不過我們只要把孟子的宣傳家的身分（他的身分不用說不止一個）認識清楚以後，也就覺得不足為奇了。當代社會問題一天比一天複雜，像孟子一般蒿目時艱的人也一天比一天增加，像「性善」一類非十分十二分單純不足以廣招徠的說法也一天比一天的滋長繁榮起來，讀

者自己應「能近取譬」，無須我舉甚麼例子了。

孟子自稱知言，又提到他能辨別四種辭，諛辭、淫辭、邪辭、遁辭，而知道每種的病源所在。我們看了孟子的性善論，覺得應該再加一種辭，不妨叫做「易辭」。而其病源便在大切心於求得一種結果，初不論這結果是商品暢銷，或天下太平；因為過於熱中，就不免把問題看得過於容易，把解決的方法說得過於容易。目前宣傳家的大患，正坐內容中「易辭」的成分太多。

根據上文，我們可以知道宣傳的結果和教育的結果，不能相提並論，宣傳在來歷上、動機上、方法上、內容上既有這種可能的弊病，則在接受的人會受到甚麼不良的影響，是可想而知的。他可以受蒙蔽，受欺騙，受利用，即或所接受的是一派未可厚非的信仰或理論，其動機決不在利用，在欺瞞，其影響的惡劣還是一樣，也許更嚴重。受騙是一時的，上過一次當的人也許可以不上第



二次，但一種偏見一經培養成功，要設法糾正，往往是一件窮年累月而不見得有效果的事。近年講教育理論的人有所謂「重新教育」(re-education)之說，也無非是想運用教育的原則與方法，就中過宣傳的毒害的人身上，挽回一些造化罷了。

上一篇文章發表了一星期之後，昆明版的中央日報很快的來了一篇社論，題目是教育家的重大責任；從表面看，它是和我的文字沒有甚麼特殊關係的，實際上却是針對着我的一個答覆。

不過中央日報的社論雖則切心於答覆我的文字以及近來教育界所發表的一切類似的議論，實際上它又沒有能真正的答覆。我說宣傳不是教育，多少還說了一些爲甚麼不是。那篇社論說宣傳就是教育，却沒有說爲甚麼是。它只引了孔子、孟子、以及中山先生的說法作法，認爲這就是宣傳卽教育的論證。在

一向承認或誤會宣傳就是教育的人，這種的論證無疑的是足夠了。別的姑且不論，關於孔子，論語陽貨篇裏有一段話說：「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子是一位教育家，我們很多人相信。若說孔子是一個宣傳家，我們看到了這一段話，就不能沒有懷疑。

不過我向不喜歡作辯論的文字，這第二篇裏的話也決不在和任何人辯難。前文說宣傳不是教育，意有未盡，願再就近時教育的實際情形加以申說。

前篇說過，教育一向有兩種方式與意義，一是灌輸，一是啓發，而近代教育學者的見解，則以爲唯有着重啓發的意義而力行啓發的方式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否則便是宣傳。啓發的原則原是從生物經驗中得來的。自近代生物學的昌明，而這個原則的價值更見得彰明較著。從此我們知道教育，就本人說，

就是生長，就是發展，就是功能的協調的分化；就從事教育的人說，就是培植，就是誘掖，就是啓發，也就只應限於培植、誘掖、啓發而止。一個人種一棵花，他所應盡的人事，也就是所能盡的人事，是看水分足不足，陽光夠不夠，肥料充分不充分，有沒有侵蝕它的病害蟲害，至於這花長甚麼式樣的葉子，開甚麼顏色的花朵，結甚麼香味的果實，他管得着麼？他管不着。硬要管的話，他也就是孟子所稱的一個揠苗助長的愚人。

根據上文的想法，我們很容易承認，舊日的所謂教育，大部分不是啓發式的教育，而是灌輸式的宣傳。上自經書的誦習，下至聖諭廣訓的聽受，一個人自小至老所接受的幾於全部是宣傳；至於其間究竟有沒有教育的成分，有多少成分，則一方面要看一個人自身聰明的程度，意志力的大小，與夫接受暗示的難易，而另一方面要看宣傳家在揠苗助長的時候所下的工夫的強弱久暫了。教

育成分的大小，和一個人自身的能力成正比例，而和宣傳家所下的功夫成反比例。不過世間智力特高、意志特強、不容易接受暗示的人畢竟爲數不多，而個人的撐拒終究不容易勝過社會與時代的包圍，所以『教育』的結果，終於造成了大批頑父的孝子、暴君的忠臣、庸夫的節婦，而找不到幾個『天見其明，地見其光』的成人。至於鄉僻之地，則有爲貪污土劣所魚肉的安分良民，易代之際，更有受猾夏蠻夷所役使的順孫孝子，其數量更不知紀極。這些，又何莫非以前所謂教育的重大收穫？今日持宣傳即教育之說的人似乎有不能不爲舊時教育辯護的苦衷。試問清代的皇帝，在頒布聖諭廣訓的時候，何嘗不以宣傳當教育？更試問『九一八』以來，敵人在東北的種種文化上的設施，亦何嘗不以宣傳當教育？持宣傳即教育之說的人應知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則對於宣傳究竟是不是教育的一個問題，就可以思過半了。

不過我們也得承認，中國舊時的教育始終並沒有忘記啓發的原則。以前有人爲了鞏固政權，爲了維持名教，爲了收拾人心，爲了挽救劫運，等等，固然用過大量的宣傳的功夫；但講起真正的教育來，至少講起教育的理論來，這啓發而不灌輸的原則是未嘗不昭昭在人耳目的。易蒙卦說「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的時候，教育便有兒童本位與兒童自動的意思。後世稱初期的教育工作爲啓蒙工作，顯而易見是託始於此。孔子自述教育方法說，不憤不啓，不悱不發，中間就包含啓發二字。顏淵讚歎孔子的教育方法說：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孔子真對弟子們宣傳麼？我讀到了這幾句話，便絕對的不能相信。學記是中國古時教育學說的一個總匯，也說：「君子之道，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喻字等於曉字，也是啓明的意思。以宣傳當教育的人只知道做些「道

而牽，強而抑，開而達」的工作，甚至於專做些牽抑的功夫，把自己所認為已「達」的東西硬送給人家，硬教人家「達」，並且是一模一樣的「達」；結果自然是「不和、不易、不思」，而最傷心的是「不思」！西洋哲學家說，我思，故我在。不思豈不是等於自我抹殺，豈不是和教育的最大目的「個性發展」恰恰相反？即如孟子，我們一面承認他是一個宣傳家，但他不做宣傳的時候，他始終維持他教育家的本來面目（前篇說過他的身分不止一個）；他在離婁篇裏說：「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自得兩字實在太好了。以宣傳當教育的教育的大病，正坐不讓受教的人有自得的機會。一樣用水做比喻，從宣傳方法灌輸進去的水量，和用教育方法開發出來的水量相比，一則其涸可立而待，一則取之左右逢源，豈不是有極大的分別？這話恰好

和中央日報社論裏所說「水銀瀉地，無孔不入」的話針鋒相對。孟子又論賢人政治，也引前人的話說，「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也提到「自得」的原則。先賢持政教合一之論，近世以宣傳爲教育的人也未嘗不主政教合一，其所主者相同，而其所以主之者則大異，也是很有趣的一點！

回過頭來看我們當前正實施着的教育。我以爲當前教育的最大的危險，就是：在一部分從事教育事業的人的心目中，教育和宣傳混淆不清，甚至於合而爲一。所謂社會教育，或公民教育，名爲教育，實際上大部分是宣傳，可以不用說。卽如比較嚴格的學校教育裏，宣傳的成分近來也一天多似一天，而主張宣傳卽是教育的人還慮其太少，而慮之之人事實上又不盡屬一派；於是流弊所至，非把學術自由、思想自由的學校環境變換做宣傳家鈎心鬥角出奇制勝的場





合不可。在最近的幾年裏，這種明爭暗鬪的大小局面，已經是數見不一見。學生的社團生活裏，課餘作物上，甚至於數仞的門牆之上，隨在可以發見此種爭鬪的癥痕！我們真不知道這種宣傳，和因所宣傳的內容不同而引起的更多的宣傳，究有幾許教育的意義，幾許學術的價值，更有幾許作育人才的功效。唯一的效果是鼓勵青年們入主出奴的情緒與行爲罷了。

我們細察這種以宣傳爲教育的內容，事實上也沒有甚麼新奇與卓越的地方。以言政治，則這些內容在學校課程的政治學裏也未嘗不講到；以言經濟，則經濟學的學程裏也復不少，找不到甚麼特別的挂漏。所不同的，而也許正是宣傳家所認爲不滿的，是學程之中，事實多而理論少，經驗多而理想少，細節自多而大原則少，各方面平均的議論多，而單獨一方面的發揮少，鋪敘已往與現在的多，而懸測未來的少，教人增加批評能力的努力多，而教人興起信仰精

神的努力少。不過這是沒有辦法的；除非有一天。宣傳借了政治的力量，完全把教育排擠出去，學校的環境完全變做宣傳的場合，教師完全變做宣傳家，這局面是無法改變的。這種完全以宣傳替代教育的試驗，當代實地在做的國家也未嘗沒有，並且還不止一個，零星在那裏做的爲數更多；誰都不能禁止我們不邯鄲學步，事實上我們中間想學的人也很不少，不過前途成敗利鈍的責任將由誰負，卻是一個問題；我們相信以宣傳當教育或想以宣傳替代教育的人到此也不能沒有一番猶豫。我們爲他們着想，他們目前的地位也真困難，要把宣傳完全替代教育，其急切無從措手，既有如上述，要使宣傳和學校教育並行，或把宣傳的資料滲和在教育的資料裏，則又似乎與一向揭櫫的學術自由的宗旨相反，而學校的教師，自己既在這宗旨之下訓練而來，對學生又不斷的以這宗旨相詔示，對這種並行或滲和的辦法，輕易也不會聽命。結果他們唯一可行的辦

法是在學校教育之上，添一些額外的『教育』，不幸主持這額外的『教育』的人事實上又不止一家，於是上文所說宮牆上一類的癥痕就勢所難免了。

近代有兩種教育表面上雖和宣傳沒有關係，實際上對宣傳却有『爲淵毆魚爲叢毆爵』的功用。一是偏重識字的平民教育，二是偏重專門技術的人才教育。識字所以讀書，讀書所以明理，向來是這樣說的；不過事實並不如其單純。記得有一位美國的生物學家說過一句話：你能教人怎樣去讀書，你卻不能教他們讀甚麼書（*You can teach people how to read, but not what to read*）。意思說，你教人粗識之無，是很容易的，要他知道選擇有價值的書本或寫作品來閱讀，而真正得到讀書的益處。那權力卻不在你，而在識字者本人的眼光，眼光怕是教不來的。迷信識字或誤信識字就是教育的人，一度有機會到國外出觀光，歸國之後，動不動對於外國之文盲之少，報紙之多，報紙的觀衆之廣，

總要稱讚幾句。不錯的，一個人識字總比不識字好。一國之中。文盲少總比文盲多好。但若這種觀光的人有功夫作進一步的觀察，他們很容易證實上文那位生物學家所說的話是一點不錯的。這些識字讀書的大眾十之八九是但知閱讀，而未必知選擇讀物，因為不知選擇，無形有形之中就變做所謂『黃色新聞』的最大的顧客。他們雖不知選擇，卻別有人替他們選擇，也正唯他們不知選擇，專替他們選擇的人便應運而生。這種人就是各式各樣的廣告家與宣傳家了。美國此風最盛，做宣傳家的魚與雀的民衆也最多；因而引起的社會問題也最嚴重；近年來美國社會科學界獨多關於宣傳問題的研究，而對於宣傳的危害認識得特別清楚，可見是不爲無因的了。我國近來宣傳的發達，無疑的與識字運動有很大的關係，就宣傳的立場看，這當然是一個成功，一樁進步，從教育的立場看，此種成功與進步果有幾許價值，尙有待於從長論定。

專門技術的人才教育何以也會幫宣傳家的忙，驟然看去是很不容易瞭解的。這種教育不就是理工教育麼？理工教育不極重視所謂科學方法麼？科學方法不教人懷疑，重實驗，信證據，不輕下斷語麼？何以接受這種教育的人也會做宣傳家的魚與雀呢？這解釋大概是這樣的。專門教育固屬重要，但專門教育必須建築在良好的普通教育之上，才不至於發生流弊。一個人的普通教育的底子沒有打好，而貿然接受一種專科的訓練，他對於這一項專科，也許因為年限較長，用心較久，可以有很多的貢獻；在他的本行裏面，無疑的他是一個極度謹嚴的人；他對於方法的運用，一定是一筆不苟；別人有新的學說或發明拿出來，他也決不輕易接受，他起初不免很誠懇的懷疑，接着總要把人家所發表的東西推敲一過，最後或許要依樣的實驗一道，實驗而信，這新學說或新發明才能算數。不過一出本行，一離開他的熱門熟路，這些法寶的效力就減低了，至

於減低到甚麼程度，要看他在本行中專精的程度與夫對於別行及一般學術思想的不通的程度了。要知他雖是一個專家，同時也還是一個人，他雖有他的專業，他不能不和別的行業發生接觸，亦即不能不於本行之外有些立場，出些主意；他對於政治、經濟、社會方面的種種問題，能完全置身事外，默爾而息麼？不能。不但不能，他還不免特地去尋找表示立場與意見的機會。我們知道這種人的生活往往是極辛苦的，他平時的天地極小，他的研究的對象與方法不容許他有多少迴旋的餘地，一日工完或一個問題結束之後，他不得不亟於要找一個遠足的去處，一個智識的假期(an intellectual holiday)，而信步所至，又很自然的會踏進人事與社會科學的領域裏來。這裏，就是宣傳家的機會了。專家到此，大抵拿不出甚麼高明的立場與意見來；他一些海闊天空的議論，往往一大部分是有意無意之間從宣傳方面拾來的牙慧。據說在美國加入第一次歐洲大

戰的前夕，這一類從本行裏出來散步的專家特別多，同時鬧的笑話也特別多，研究宣傳問題的人還很不客氣的舉過一些例子。

歸結上文，我們目前的教育是正在一個很危險的過程中，一方面舊時原有的宣傳的成分既未能擴清，而新的宣傳的成分又已經紛至沓來；另一方面，我們所特別提倡的幾種教育，又無形之中正在替宣傳清宮除道，並且做一個有力的前驅。如何消弭這種危險，是目前教育的一個最大的問題。

## 附錄 教育家的大貴重任

教育是革命建國的基本事業，教育家是負有革命建國的大貴重任。總裁領導全民抵抗暴敵，維護人類正義，保障東亞和平，這所謂以一身繫天下之重，而他自己總說：『自黃埔興學以來，未嘗一日離棄教育者之生涯』，可見在革命領袖的眼光中，教育家對於國家民族所負的責任是何等重大了。

然則，教育家如何纔可以負起他的大貴重任而無愧呢？總裁在十天以前勗勉全國校長的電文中，訓示已詳，茲再引申其義，更舉兩端言之。

一、確立中心思想。往昔學界人士，有惑於思想自由之說者，以爲幻想空



論，不妨清談，立異標新，可稱詭辯，於是稗販學說，莫衷一是；他如頑固之徒，抱殘守闕，又以爲教育乃清高事業，應與政治絕緣。殊不知國家存亡，民族生死，既已間不容髮，斷不容各逞臆說，貽害青年。而教育原爲國家作育新民，栽培英俊，自更與政治法律等息息相關。唯其如此，欲國民之衆志成城，必先求教師之一心一德。欲國民之具危授命，首先求教師之赴義爭先。教育家而果皆以總裁之心爲心，以總裁之志爲志，則必首先對『建國原則』之三民主義，確立生死不渝之信仰，然後一切『脫離現實之空想』，『僥倖成功之幻想』，可以一掃而空。夫以全國之校長教師，服從 總裁之領導，『奮其毅力』，『發其熱誠』，則十年二十年前，我國教育無中心無本質所發現之缺點，『散漫凌亂，自私自利之風習』，必因教育家之一致努力，而煥然改觀。全國青年身受此偉大時代新教育家的陶鑄，也必能健全他們的思想，齊一他們的目標，

在目前則抵抗敵人殘暴的侵略，在將來則擔當復興建國的使命。這是青年光榮的前途，也就是教育家不朽的功績。

二、重視革命工作。少數學校教師，在平時不無懷着一種錯覺。以為祇要能夠傳授學生以知識技能，已經盡了他們的天職。姑無論這種見解是否合乎真理，但至少我們得說，在此抗戰建國的非常時代中，抱這種狹隘觀念的教師，斷不能負起領導青年的責任的。不但如 總裁所示教師之對於學生，必須於知識技能之傳習以外，更「毅然肩負指導學生思想，陶鑄學生品性，管理學生生活，鍛鍊學生體力，健全學生人格之責任」而且應該認識，教育本身就是一種革命工作——革命的宣傳工作。須知孟子所謂「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這是教育，也就是宣傳。教育者無他，持久的宣傳罷了。有人以為沒有純文藝，凡是文藝，都是宣傳，我們於教育，也可以這樣說。總理曾經有一段

話：「人類的天性，本來沒有蜜蜂和螞蟻的天生長處，所以能夠變好的原故，多半是由於學習。普通人要學習，便是不知，先知先覺的人要他們知，便應該去教育，這便是宣傳。」孔子爲萬世師表，中國歷史上一個最偉大的教育家，可是總理卻稱頌孔子是最有力量的宣傳家。他說「今日中國的舊文化能夠和歐美的新文化並駕齊驅的原因，都是由於孔子在二千多年前所做的宣傳工夫。」即此可認教育，的確就是宣傳，毫無疑義，宣傳是革命建國的重要工作，而教育家。在實質上就天天負起這重要任務，如何可以忽視革命工作，以爲與我無干呢？我們常說，要實施三民主義的教育，所謂三民主義的教育者，三民主義的宣傳而已，不但講「公民」，講「黨義」，離不開三民主義，推而至於教「國文」，教「史地」，教「衛生」，教「常識」，教「體育」，乃至教一切社會科學，都應該把三民主義的精髓灌輸進去。須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夫

然後可謂盡三民主義的教育之能事，可謂無負革命工作之重大使命。

全。國。的。校。長，全。國。教。師。諸。君，既。為。現。代。中。國。的。教。育。家，也。就。是。為。現。代。中。國。在。抗。戰。大。業。過。程。中。的。宣。傳。家，諸。君。肩。負。革。命。的。大。責，擔。當。建。國。的。重。任，黽。勉。辛。勤，艱。苦。卓。絕，必。能。作。育。新。民，完。成。使。命，受。百。世。無。窮。之。尊。敬。

註：附錄係昆明版中央日報的社論，文中的密圈是我添上的。

---

---

時代評論小叢書

費孝通：人性和機器  
潘光旦：宣傳不是教育  
費青：從法律之外到法律之內  
吳之椿：民治與法治  
費孝通：農民和士紳  
潘光旦：永恒的三角

生活書店發行

---

---

---

---

新知識初步叢刊

胡 繩：思想方法論 初步

趙冬垠：經濟學 初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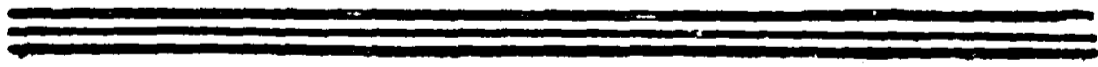
陳 原：戰後新世界

孫起孟：演講 初步

蔡 儀：文學論 初步

莫偉夫：我們的地球

生活書店發行



活生